

●王世学

《四库全书》与清代辑佚

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规模宏大，不但在国学丛书中首屈一指，而且也是世界性的大宗文化遗产。清廷在编纂这部“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整个过程中，有过也有功。虽然芟削、销毁、任意改易，摧残了很多宝贵文献，给我国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也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为突出的是《四库全书》在辑佚方面成果累累，功绩卓著。

我国辑佚始于南宋，消沉于元、明，为什么到了清代又兴盛起来？这不但与中国历史文献大量亡佚相联系，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号称“盛世”的康、雍、乾时代，也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猖獗的时期。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文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加强思想统治。康熙御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并将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从思想上箝制人民。通过恢复科举，开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以笼络知识分子。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同时编纂大型工具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康熙字典》。乾隆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使文人学士老死于敝纸瀚墨

之中，消弭其反抗情绪。《四库全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纂修的。为了更彻底地消灭人民的反清意识，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清朝文字狱之多、株连之广、刑罚之酷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学者面对苛密的文网，闹得人人战栗，谨小慎微。“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诗句真实地写出了当时人们的恐惧心态。由于研究天地十分狭窄，不少骚人墨客只好将自己的聪明才力投入与世无争而官方倡导的古书整理方面，对几千年来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典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订、校勘、训释、辑佚。聚士修书风气，正是这种文化政策的产物。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新的读书要求。为了考镜学术源流，征引材料出处，必须大量阅读各种古籍。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天灾兵燹，专断禁毁，不少古籍正在逐渐毁失亡佚，为了多读书和读原书，这时已有不少人从古书中辑录遗书。

清代辑佚是逐步展开的。在修纂《四库全书》以前，已有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收罗遗逸，虽然范围很小，数量不多，却成为清代辑佚的先声。比较著名的如康熙进士、钱塘人姚之骃以为“夫他书可逸，惟史当补。近史繁或可逸，古史文约尤当补”，于是撰《后汉书补遗》21卷，计辑《东观汉纪》8卷，谢承书1卷，薛莹、张潘、华峤、谢沈、袁山松诸人各1卷，司马彪书4卷。其书尽管抉择不精，考辨

不力,体例不善,挂漏殊多,然有开辑诸家《后汉书》先例之功,在当时影响颇大。

清朝经过 60 年的经营,到乾隆时,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科学上都达到了极盛时期。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提倡汉学,炫耀文治之盛,清高宗在完成十全武功后,决定编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是时,周永年大力提倡“儒藏说”,仿释道二藏建立儒藏,得到士林响应。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正月,下令各省广收遗书,汇送京师。但清朝辑佚之风日昌,却是在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之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虽然拙劣,“然古书之全而世恒覩者,辄其在焉”,请校核《永乐大典》,择取缮写,搜集遗书。乾隆皇帝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成为编修《四库全书》的一个重要起因,所辑内容又是《四库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辑佚主要是引用《永乐大典》各韵目条下的七八千种书目,经过精细校勘、辨伪和审定,把见于群书中有价值的文献佚文辑出来,力图恢复其原貌,或将其零篇断简汇集成残本,辑出大量宋、元文献。乾隆三十八年,设四库馆,开馆修书,以孙士毅、纪昀、陆锡熊任总纂官。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第一份告罄。后陆续编写,共成 7 份,分贮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称内廷四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以上称江南三阁),底本贮翰林院。

这样大规模的文字考订和汇编书籍的工作,不依靠众多学识渊博的文人名士,是难以成功的。经过多方网罗,当时全国各地有名望的学者,象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于敏、金简等人都参加了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真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戴震、邵晋涵、周永年 3 人都是校勘《永乐大典》的纂修官,在学术上各有特色。特别是汉学家周永年,不仅对校勘学十分精通,而且对佚书的辑录、整理,更是不遗余力,表现出坚强持

久的意志和细大不捐的周密精神。从《永乐大典》抄辑遗书,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苦心排比,乃克成编,十分艰辛。尤其是周永年,在艰难繁巨面前不畏缩,始终孜孜不懈,精心果力。他盛夏挥汗,寒夜挑灯,终于将长达二万多卷的《永乐大典》残本翻检一遍,从中又辑录出宋人刘敞、刘颂兄弟的《公是集》和《公非集》等十多种早已不传的罕见古书,为校勘《永乐大典》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众多学者的鼎力合作,从《永乐大典》辑出亡佚之书达 516 种,除 128 种存目外,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共有 388 种,其部属如下:经部 70 种,史部 41 种,子部 102 种,集部 175 种。所录之书的总数大约占整个《四库全书》的 1/9,比重不小,成绩惊人。如果不是四库馆及后来的学者大力抢救,这些世间罕见的珍本秘籍恐怕早已湮灭殆尽。因此,可以断言,清儒辑佚功不可没。

二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之时,也是掀起大规模辑佚之日。此次辑佚,成就非凡。所辑之佚书,以卷帙而论,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薛居中《旧五代史》150 卷,郝经《续后汉书》90 卷,《宋两朝纲目备要》16 卷,王珪《华阳集》70 卷,熊克《中兴小记》40 卷……。其余二三十卷以上之书,尚不下数十种。这些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几乎反映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领域的所有方面,是历史研究中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资料。如东汉班固、刘珍写的本朝史《东观汉纪》,为我国最早的官修史书,范晔作《后汉书》时未予采录,其书元代已佚,重新辑出后,可以补正范书阙失者颇多。又如《旧五代史》,四库官邵晋涵在辑佚时,因为《永乐大典》中有缺文,又佐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览考异》、《五代会要》等一百多种宋人典籍,搜罗采集,补其所缺,辑成全书,共得 150 卷,从此以后遂有二十四史之

称,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再如汉至元古数学书《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晋刘徽《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北周甄鸾《五经算术》、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元李治《益古演段》等很早就已佚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也有些书因篇章残缺,根据《永乐大典》葺而补之,象《春秋繁露》就是。有些书看上去虽然完整无缺,但讹舛失真,根据《永乐大典》雠而正之,象《水经注》便是。就是修书时正在流行的一般书籍,如果没有《四库全书》的加以汇集,经过此后的百余年,尤其是清朝末叶丧权辱国,兵燹攘窃,不知又会失多少。凡此种种。这些佚书的发掘,如同打开了一座久埋地下的宝藏,立刻迸发出璀璨眩目的光彩,使许多被湮没的珍贵文献传下来,嘉惠后世学子。

三

自从四库开馆,就拉开了清代辑佚的序幕。序幕拉开,高潮迭起。不仅官家着力搜罗逸,而且清儒好古成狂,受开四库馆而辑出佚书的影响,不少私人也起步走上辑佚的道路。一部分人继续在《永乐大典》内下功夫。因为《永乐大典》虽然经过馆臣采集,但由于这些人中大多数毕竟居官求逸,作风粗疏,其中蕴含的丰富资料远远没有摭拾干净。经过这些后来者的抄录,又相继辑出一二百种,流传于海内。乾隆三十八年,象徐松辑录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150卷、《元河南志》4卷;胡敬辑录的施谔《临安志》16卷、《大元海运记》1卷;缪荃荪辑录的《宋十三处战功录》1卷、《顺天志》、《滤州志》、《国朝百录》诸书,以及邵晋涵辑录的《九国志》等书,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也正是这些学者的功绩所在。另一部分人,则向更前的朝代进行辑佚,想要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已散失者次第辑出。他们辑佚所凭借

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如下诸类:

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玉海》等。

二、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如《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论衡》等所引古子家说;郑康成诸经注、韦昭《国语注》所引纬书及古系谱;

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如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从孔贾诸疏辑《尚书马郑注》、《左氏贾服注》等。

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以下《史记》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

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古选本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清修《四库全书》之后,辑佚成为风尚,因此,涌现出很多大型辑佚书和著名辑佚家。如从学于邵晋涵的章宗源,毕生从事辑佚,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甚众,惜后多流落他人之手,未予刊刻。后有王谟所辑《汉魏遗书钞》及《汉唐地理遗书钞》,黄奭所辑《汉学堂丛书》,马国翰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等,都是洋洋大观。特别是马国翰所辑之书达580余种,卷帙繁富,搜罗完备。受其影响,后来尚有多种同类辑佚的汇补之作出现。其他学者如孙星衍、严可均、孙冯翼、洪颐煊等人,则广辑各书,不拘一类。他们编纂的辑佚书,大都包罗四部,不下千百数种。如严可均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唐以前作家已经散失的作品,辑成746卷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一部,使读者一书在握,便可看到上古至隋代所有现存的单篇文章。由于这些学者的艰苦努力,辑佚的大量典籍,填补了我国学术领域的许多空白,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增添了光辉。

(下转 83 页)

实用性和广泛性，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六 提高人员素质，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比例协调的图书馆古籍工作专业队伍。

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灵魂。提高人员素质，是搞好藏书利用的关键。普通古籍藏书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涉及多学科知识的学术性、服务性工作，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除具备一般图书情报知识外，还必须在古汉语、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有一定造诣，还应努力掌握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热爱本职工作，富于进取精神，热心为读者服务。

图书馆工作的不断发展，给人员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看到提高人员素质，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人员水平发展的规划和培训计划，保

证采访、编目、阅览等各环节工作人员高、中、低层次的科学搭配，使结构日趋合理。在队伍建设中，还应注重实施岗位责任制。国外图书馆在人员管理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如要求工作人员具有双学位或多学位制，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等，都值得仿效。我们也应创造条件，鼓励每个工作人员学习第二、第三专业，学习外语知识，刻苦钻研业务，促进人员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普通古籍藏书利用工作的开展。

杨晏平 1986年首都联大图书馆学系毕业，现在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工作，馆员。所写《浅谈我馆普通古籍采访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文曾获奖。并参加过《中华大书典》，《英汉缩略语综合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合作辑录的清代契约文书已在《文献》杂志上陆续发表。通讯地址：北京文津街7号 邮编100034

（来稿时间：1992—09—19。编发者：丘峰。）

（上接78页）

四

《四库全书》馆臣所辑录的典籍，一般来说都比较成熟，然而也并非无缺憾。或因皇家忌讳，或由于馆臣好恶，更加之该书出自多人之手，故疏漏、讹误、窜改之处在所难免。例如邵晋涵所辑《旧五代史》，与今存《永乐大典》残卷相校，就发现有抄误、漏辑、芟削、窜改等多处。而私人辑佚之书，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缺憾，但受个人能力所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著名辑佚学者汤球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就把大量不是《十六国春秋》的佚文也补了进来。汤氏所辑的晋史、十六史著作，在内容上也错漏甚多，给后人研究带来诸多历

史遗憾。但总起来看，清代的辑佚，尤其是四库开馆以后，内容越来越完整，体例越来越规范，逐渐地走上科学化，作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学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四库全书》不但辑佚的文献众多、门类广泛，而且辑佚的体例完善、内容完整，对辑佚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标志着我国辑佚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四库全书》，就没有清代辑佚学的发展，编纂《四库全书》是清代辑佚发展的直接动因。

王世学 郑州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曾以鲁夫、予文等笔名发文10余篇。通讯地址：郑州市 邮编：450052

（来稿日期：1993—04—12。编发者：丘峰。）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at comes first on the list of series books of China. Though it was an outcome of the civil governance of Qing Dynasty, it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for sorting out and preserving the ancient cultural books and records of China and has at the same time pushed forward direc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compiling the lost books in Qing Dynasty.

"Si Ku Quan Shu" — Appraisals and evaluations

Science of compiling the lost ancient books — Developments

G256.2

Approaches to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General Ancient Book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Yang Yanping. —79~83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s collected 82000 titles, 1956000 volumes of general ancient books which cover 73.6% of the total ancient books of the Library and 13% of the total collection, but the average annual usage ratio of them covers only 3.9%. The author holds that activities of publicity and inform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onfluence cataloging should be speeded up and the collation of data, the research work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hat library collection benefits will be improve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Holdings

General ancient books —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G255

